

《新华日报》举行战地记者招待会

□ 郑学富



《新华日报》战地记者招待会合影

前方看见许多的实际问题，当不限报纸上所发表的，如我军抗战许多英勇事迹，如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不够深入，军民的关系还不够密切，民众疾苦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还有种种困难，所有这些问题都希望诸君写些报告发表出来，这不仅不是国人的希望，而且对于地方行政当局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此次诸君在前方的工作中表现出空前团结。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种互助团结的精神，不仅是新闻事业取得胜利的保障，而且是民族解放胜利的保障。现在我举杯庆祝诸君的健康和新的胜利。”这段热情洋溢的发言，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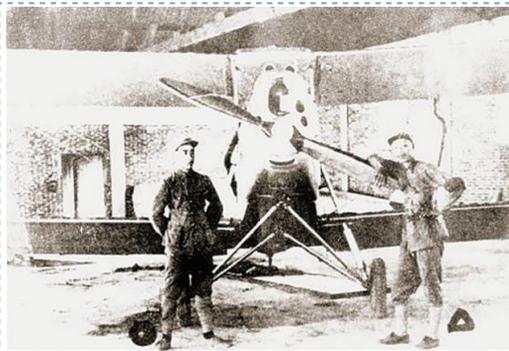
政治部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的胡愈之，《新华日报》陆诒，《大公报》范长江，《星中日报》胡守愚、黄薇，《扫荡报》张剑心，《武汉日报》周海洋等先后发言。范长江在发言中说道：“过去各个报社只是对他们自己派出的记者进行慰问，没有一个报馆会对我们举行全体慰劳的。今天《新华日报》不仅慰劳他的记者陆诒先生，而且慰劳我们大家，使我们非常兴奋和感谢。今天下午青年记者学会对于我们全体举行慰劳，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新闻界由狭隘的活动变成广泛的职业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还报告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第五战区成立分会的情况，表扬了华侨记者在战地的出色表现。特别是华侨女记者黄薇，当徐州危急时候还是不顾个人安危，想留在徐州继续采访战地新闻。同

时，他还希望当局能够帮助战地记者解决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困难，以便使战地新闻工作做得更好。在招待会上，各位记者经历了生死考验，劫后重逢，大家感慨很多，他们除叙述了在徐州突围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险象外，大多谈的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抗敌和民众奋不顾身、踊跃支前的英勇事迹，还议论了国民党军政部门存在的不利于抗战的一些问题。

这次招待会隆重热烈，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钟。会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王明、博古、凯丰、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和《新华日报》等报社的负责人主动站到后排，让前线归来的战地记者坐在第一排，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领导与记者这种不分上下、亲密无间的精神，为新闻界所少见，这张照片也是新闻史上的一张珍贵史料。

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由于他有紧急公务没有出席新华日报的招待会。他于5月26日专门给范长江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慰问：“听到你饱餐着前线的英勇的电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人们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当周恩来得知记者反映的一些情况后，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改进抗战工作。他约范长江和陆诒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详谈。他认为记者们反映的战地民众动员工作、军民关系和军队政治工作等问题都很重要，并约定时间请范长江等20多位记者到汉口军委会政治部与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一起座谈这些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梳理后，及时反映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受了记者们的一些建议，改进了一些工作。所以在全国抗战初期，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中国社会的政治局面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新闻记者们不仅在新闻报道中作出了有利于抗战的贡献，而且通过他们所揭露的材料，还有利于推动国民党改进军政工作。



红军东路军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在攻占漳州后缴获的飞机旁留影

中央苏区的第一架飞机和第一个机场

□ 钟同福

1932年3月上旬，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让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受命赶往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向正在休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报告赣州久攻不克的消息，并请毛泽东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当即冒雨和项英一起直奔赣州城外。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苏区中央局批准东路军攻打漳州。

1932年4月10日，红军东路军全歼塘埔守敌。当天下午，红军乘胜兵分两路进攻龙岩城，一路由龙门正面进攻西门；一路绕道铜钵，从背面攻入北门。防守龙岩城的张贞部独立团多系新兵，缺乏战斗力，一经红军攻击，自行溃逃。红军一举占领龙岩城。

张贞闻讯龙岩被攻，不知战况进展如何，急派飞机前往龙岩侦察，飞机飞至龙岩上空，只见城内红旗招展，原想降落加油已不可能，只好匆忙飞回漳州。结果，慌中出错，飞错方向，朝同安飞去，挂在朝天岭的大树上。此后，“张贞的飞机吊在树上”，一直成为流传于闽南人口中的笑话。

是役，东路军消灭守敌张贞部1个多团，俘敌685名，缴枪900多支。龙岩战斗，红军初试锋芒，旗开得胜。龙岩之胜，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4月11日，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红一军团师长、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的胜利经验，部署下一步行动：红一军团第四军、十五军和红五军团第三军为攻坚主力；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留驻龙岩保障后方；闽西军区红十二军在上杭、武平一带警戒敌寇。

4月14日，负责攻漳的东路军各部按时集结于龙岩，向漳州进发。4月19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红四军的主攻部队在机枪掩护下，以风霜岭、十字岭为主攻目标，向敌人猛烈进攻。十字岭守敌一四六旅陈启芳团以机枪连为先锋，向红军战士疯狂扫射。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冲锋在前，喊杀声响成一片，奈何敌人占据高地，担任先锋的红军部队发起数次冲锋均未奏效，不少战士倒下了，鲜血染红了山岗。至下午3时，战斗胜利结束。红军攻克漳州，共歼敌4个团，俘敌1674人，缴获步枪2331支、机枪9挺、火炮6门、子弹13320发、炮弹4942发、炸弹242枚，飞机两架。这是一次完胜的战役，也是攻打中等城市的成功范例。

4月20日上午8时，红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典礼。1932年5月8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圆满完成东征漳州的各项任务，回师瑞金。

在这次漳州战役中缴获了两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非常高兴，纷纷赶来观看，聂荣臻和林彪特地与飞机合影。看到这架飞机外观基本完好，红军决定修复为己所用。找到了曾在苏联上过航校的冯达飞任命为飞行员。当时在漳州的漳州汽车公司工人张国材、陈文川等人被请来修复飞机的工作。当时被红军击伤的那架飞机稍微检修还能使用，另一架确实存在故障，无法使用了。

它很快就开始执行任务，恰逢“五一”，正赶上红军在漳州召开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冯达飞根据命令，趁着试飞之际，驾驶着飞机在会场上空抛撒传单，这架飞机也被命名为“马克思”号。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当时提出：“要把飞机开到瑞金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飞行队伍。”消息传到瑞金，苏区瑞金3000军民在瑞金叶坪的沙岗奋战了6天，修建了平整开阔的飞机场，等待着飞机的降临。

当时聂荣臻正好要回瑞金汇报战况，就坐着冯达飞驾驶的“马克思”号返程。聂荣臻乘坐“马克思”号返回瑞金时就是在瑞金沙子岗机场降落的。这架飞机后来还在长汀公园展出过。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1991年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红军攻打漳州的经过，他提到在打下漳州之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是乘飞机从漳州飞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汇报战况的。当时杨成武还对他讲：“你怎么冒冒失失的，也不知道那个飞行员技术可靠不可靠就飞回去了？”

《聂荣臻回忆录》中提到，在漳州缴获两架国民党的飞机，我和林彪还在飞机前面照了一张照片，这两架飞机都是小型侦察机，一架缴获时就不能开，一架能开，由一位朝鲜同志把它开回瑞金。

《瑞金县志》记载，1932年5月，县苏维埃政府动员王田、云集、黄柏、九堡、武阳、桃黄、下肖、黄安、城郊等区群众3000多人在沙子岗修筑飞机场。

后来飞机因为没有燃油，只能停放在瑞金沙子岗钟氏祠堂供苏区群众参观。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转移前夕将飞机埋藏起来，国民党部队占领瑞金后被他们挖走，还登报大肆渲染称“埋藏飞机二架已取回，大部件尚可应用”。作为红军中少见的高技术武器，“马克思”号短暂的生涯，亦堪称传奇。



·人物春秋·

忆韩正卿在民乐二三事

□ 李晓燕

参加地方史志工作之初，因工作需要我时常翻看各地志书资料，其中民乐县原县委书记韩正卿为《民乐县志》所作“我爱民乐”序中，“我爱民乐的山，我爱民乐的水，我更爱民乐的人”，这一句真情流露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有个坏习惯就是养猪不圈猪，由此带来的因随意觅食而被毒药毒死、铁叉戳死、被狗咬死或下落不明的事常有发生，为此引起的民事纠纷也时有发生。韩正卿书记针对这一问题跑遍全县村寨，到处开会时也强调把猪管起来，改变“撒野猪”的不良习惯。当时我的公公抽调担任高寨大队工作组组长，在对该大队3个村养猪不管猪的情况作了专题调查后，和大队干部研究召集每家各户的“主要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管猪问题，社员们一致同意：一定要把猪圈起来。对于圈不住的猪采用哪些措施，最后决定放出消息，凡是放出来的猪统统杀掉，不给养猪户分文报酬，是哪个队里社员的猪就送到哪个队在平地平整地点上的工地

为社员们改善生活。次日清晨，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拴猪圈猪。临近中午时分，往日那种出门就见猪、处处都有猪的景象，烟消云散。

为了改变民乐县贫困落后的面貌，韩正卿书记背着粪筐拾粪下乡，带动全县各级干部、社员群众重视积肥劳动、发展农业生产积极性，“背粪筐的县委书记”传为佳话。那时，他出门就背着粪筐边走边拾，走到哪里就把拾满的粪倒到那里的集体粪堆上。全县各公社的很多生产队饲养场粪堆上都有他拾下的粪。就连他乘坐的北京吉普，除走张掖开会外，凡是在县境内走社串队，车后面总是吊个粪筐，座位前放个粪叉，走到路上两眼盯着左右和路面，一旦发现粪便就叫司机停车下去拾粪。他的这种务实作风时至今日在民乐县还被传颂。

韩书记1972年秋天到民乐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全县劳动力大干快上修建双树寺水库。水的问题解决之后，他考虑的是如何发挥水的效益。民乐沿山社队海拔高、气候寒冷，作物品种少，自然灾害多，发展前景小。针对这一

地情，韩书记提出按长远规划开发土地广袤、土壤肥沃、无人居住的北部滩，也就是现在的民乐六坝工业园区。

为了开辟这块土地，韩书记带领勘测队规划设计田畴道路、渠沟林园，带领县城机关干部、单位职工拉运石头修渠砌坝，召开社员大会苦口婆心动员大家往北滩搬迁，出面解决迁移群众的交通运输、建房材料和筹办教育、卫生等设施，组织新建公社、大队，落实体制建制、配备干部，为长远发展这块地方创造了基本条件。如今，这里高楼林立、景色宜人，已建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和丝路田园综合体，成为民乐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基地。

韩正卿书记在民乐工作八年，为发展民乐的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作出了卓越贡献，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公仆赞歌。在他八年如一日的县委书记岗位上，不论是在平地平整的田间地头，还是修建水库的大坝涵洞，或是植树造林的渠边路旁，都在民乐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甘肃人物·

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赵充国

□ 柴多茂

靖边卫国 普满天下
赵充国统帅一万多骑兵，从长安出发，浩浩荡荡，一路直赴金城（今兰州市），驻军在黄河南岸。为了防备渡河时遭羌人偷袭，赵充国连夜派三支精锐部队偷渡黄河，在对岸构筑了防御工事。次日，在对岸将士的掩护下，全军顺利渡过黄河，在河北岸设立大营，严阵以待。

羌人得知赵充国率军渡过黄河，立即派出小股骑兵。汉军将领一个个立功心切，请求出战迎敌。赵充国认为羌人骑兵挑衅，目的是诱汉军出战，不能上当，遂传令只可坚守，不可出战。羌人骑兵叫阵几日，不见汉军出战，只好悄悄退去。赵充国见羌人骑兵撤退，立即率兵进入咽喉要道四望峡（今兰州西部的八盘峡，一说为今老鸦峡），继而直插西部都尉府（今潼中县镇海堡）。

赵充国率部进驻西部都尉府，是他作战计划的第一步。在西部都尉府安营扎寨后，汉军却不主动出战。赵充国安排部队每天大摆酒宴，犒赏将士，兵士们一个个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羌族首领更是莫名其妙。他们天天派人挑战，赵充国就是不予理睬。

原来，这是赵充国制订的一套对付西羌的攻心策略。他非常清楚，西羌各部族的联盟其实是一盘散沙，联盟中有不少弱小的羌人部族是被裹挟进来的，并不想反叛汉朝。在西羌各部族中，先零羌的势力最大，反汉的立场也最为坚定。赵充国计划先在心理上瓦解西羌联盟，然后再对先零羌进行打击。

当时，西部都尉府的牢狱中关押着不少羌人部族的反叛将领。赵充国到来后把这些羌人全部释放，并对他们说：“此次汉军到来只杀那些有罪的反叛者，你们是被裹挟进来的，现在放你们回去，转告各部族首领，与叛乱者断绝关系，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汉军捉拿叛贼的人，都一律免罪，并给予奖赏。”

赵充国的这个做法传到长安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汉宣帝和大多数官员都反对。于是，酒泉太守辛武贤向汉宣帝进言，要重新调集部队，每人带足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奔袭青海湖一带的羌人。这样，即使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羌人的大量牲畜和人口，震慑羌人，逼他们退兵。

汉宣帝同意了辛武贤的意见，一面向陇西调集军队，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告赵充国。

赵充国和众将领认真研究辛武贤的意见，立即上书反驳，认为从陇西到张掖，再到羌人属地，要绕道千里，如果一匹马驮30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装备，负重过重，难以快速前进。就算能快速前进，等到汉军赶到，羌人早逃之夭夭。就算他们不逃，只要在汉军必经之地设卡，或者据险扼守，或者不断骚扰，或者截断汉军粮道，就能打垮汉军。

汉宣帝和朝廷大臣收到赵充国的前线奏报，没有进行认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们坚持认为，先零羌之所以兵强势盛，敢于反叛朝廷，是因为受到其他羌人部落的支持。对羌人部落，不论大小强弱，应该一律打击，毫不留情。汉宣帝固执己见，对赵充国下诏斥责，同时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西羌。

对汉宣帝的斥责，赵充国没有反驳。他认为，作为前线将领一定要从战场实际出发，坚持正确主张。于是，他再次上书，陈述自己的主张。终于，汉宣帝被说服，采纳了他的意见。（连载三）